

第一章 日本面临新的国际环境

第一节 美苏缓和下的世界巨变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的以美苏两极对抗为主要特征的世界格局开始发生变化，即处于这一格局中心地位的美苏两国开始改变过去处处对抗的做法，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开始缓和，而且这一次缓和不同于 70 年代东西方利用缓和来扩充军备的策略之举，而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缓和。当然，这次缓和有其内在的深刻原因，但不管怎样，它带来了战后国际关系最重大的变化，最终使整个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苏成为这个世界上仅有的两个超级大国，而且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很快又导致了双方军事上的对立，并组成了各自的军事集团，长期以来在世界各个地区形成对峙，使整个世界都几乎据此分成了两大部分。虽然在此期间也由于有其他力量的出现而在一定程度上侵蚀或改变着这一结构，如第三世界的出现和中苏的分裂以及西欧、日本的崛起等，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美苏两极对抗的世界格局。

1985 年，苏联最高领导层发生政权更替，新一代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上台。不久，苏联即开始进行改革，这一改革包括对内与对外两大部分，即对内实行公开性政策，对外实行新思维外交。所谓新思维外交，就是放弃与美国在意识形态与军事上的对立，强调双方共同的利益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大力裁减军备，缓和东西方关

系，放松对东欧盟国的控制等。虽然从根本上来说，这是由于苏联在长期与美国的竞争中已渐渐感到力不从心，尤其是国内的经济状况已使其难以继续与美国进行较量而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选择，但也并非一项权宜之计，因此很快就得到了美国的回应，况且此时的美国也深深被军备竞赛所拖累，其经济发展也受到了影响。

1985年11月19日至21日，戈尔巴乔夫与美国总统里根在日内瓦会晤，这是美苏两国首脑在1979年6月维也纳会晤后事隔6年之后的首次会晤，标志着由于70年代苏联大肆扩张而导致恶化的美苏关系开始有所恢复。两大国首脑对地区冲突、裁减与不扩散核武器和当时正在举行的美苏关于中程导弹的谈判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取得了一些进展。美苏的缓和进程开始启动。随后，戈尔巴乔夫又不断向美国抛出橄榄枝，提出一系列裁减军备的建议。经1986年10月戈尔巴乔夫与里根在雷克雅未克会晤中就消除中程导弹问题基本达成一致后，1987年12月戈尔巴乔夫与里根在华盛顿再次会晤，签署了《美苏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即所谓《中导条约》。这一条约的签署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因为它是美苏之间第一次真正裁减军备，而过去的马拉松式的谈判双方都在限制发展数量上与质量上讨价还价，其目的在于限制而不是裁减，而且总是试图限制对方而发展自己。

在美苏缓和的大气氛下，过去作为苏联盟国的东欧国家内部开始发生变化。1989年下半年开始，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都先后发生剧烈的社会动荡，导致政权更迭，放弃了社会主义的道路而选择了西方式的发展道路，并且逐渐脱离了苏联的控制，使美苏两极格局中的苏联一侧的力量大为削弱。美苏两极冷战格局的基础已逐渐坍塌。1989年12月2日至3日，戈尔巴乔夫与美国总统布什在欧洲岛

国马耳他附近海面的军舰上会晤，讨论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和召开全欧会议以及扩大两国经济贸易关系等议题，但最为重要的是在会晤结束时双方首脑共同宣布结束冷战，从而使长达四十多年的美苏两极对抗格局正式宣告结束。

随着美苏冷战的结束，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战后一直作为东西方对峙前沿的被分裂为东西两部分的东德与西德。本来早在 1989 年 11 月，即整个东欧都正处在剧烈变动的时候，作为东西方对峙象征的柏林墙就已被拆毁，而此时的西德更是积极谋划两德统一，实现战后多年以来的梦想。在美国和苏联的默认下，西德迅速地完成了对东德的合并，1990 年 10 月 3 日东西德统一，冷战在欧洲造成的最大分裂终于被弥合。

东欧发生巨变之后，过去作为东方集团军事力量的华沙条约组织也变得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在两德统一之前不久，民主德国就退出了华约。1991 年 2 月，华约国家又举行特别会议，签署了《关于从 1991 年 3 月 31 日起中止在华沙条约范围内签订的军事协定的效力和废除华沙条约的军事机构和结构的议定书》，宣布停止一切以华约名义进行的军事行动。事隔不到半年，华约国家再次聚会，但这是为华约送葬的最后一次聚会，各成员国签署了《关于使 1955 年 5 月 14 日于华沙签署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和 1985 年 4 月 26 日延长上述条约有效期的议定书停止生效的议定书》，宣告华约解散。从此，构成东西方冷战结构主要部分的一大军事集团不复存在。

不仅如此，东欧的巨变迅速波及到了苏联本身，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但未使苏联变得更好，反而引起了苏联社会种种问题与矛盾的总爆发。公开性和政治多元化造成了苏联政治理念和政治权威的丧失，长期的经济停滞造成了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与人心不稳，再加上严重的民族问题，最终使苏联也悲惨地走向了解体的命运。

1991年8月19日，苏联发生了推翻戈尔巴乔夫的军事政变，虽然政变很快被平息了下去，但戈尔巴乔夫已无可挽回地失去了总统的权威，他所竭力促成的新联盟条约也宣告流产。12月18日苏联的三个加盟共和国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首脑聚会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签署了《独立国家联合体协定》宣布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现实已不存在。12月21日包括以上三个共和国在内的11个共和国首脑聚会哈萨克首都阿拉木图，签署了《阿拉木图宣言》和《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定的议定书》宣布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从而宣告了苏联的解体。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次日苏联议会批准了苏联正式解体的决议，苏联不复存在，克里姆林宫顶楼上悬挂了69年的苏联镰刀斧头国旗悄然落下，换上了俄罗斯的三色旗。

东欧巨变、两德统一、华约解散、苏联解体……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发生的这些另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战后国际政治的基本格局，整个世界都面临一个新的国际环境。对每一个国家来说，也都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冲击或影响，每一个国家都不得不制定适应新形势的对内对外政策，甚至有可能引起整个国家战略的改变。对一些大国来说，尤其是如此。东亚地区虽然不像欧洲那样由于冷战的结束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同样也受到了冷战结束的影响，本地区内的一些大国也同样在试图适应变化了的世界而调整自己的内外政策。

第二节 国际环境的新特点

冷战的结束，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全球东西方对峙基本格局的彻底完结。战后这一最重大的变化，导致了国际环境的改变与国际关系的重组。这一变化给国际环境带来了一系列

新的特点。综合起来看，冷战后国际环境的新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多极化趋势增强

美苏两极格局无疑已经彻底解体，代之而起的新格局正在逐渐形成。不过这次新旧格局的转换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次转换，即过去由旧格局向新格局的转换都是通过战争手段来实现的，而且往往有一个确切的事件（一般为一次战后会议）来作为新格局形成的标志。例如，拿破仑战争后的维也纳会议形成的以英、俄、普、奥四国为主导的欧洲多极均势格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会议形成的以英、法、美、日等国为主导的欧洲和亚太地区的多极格局，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的雅尔塔会议形成的以美苏为主导的全球两极格局。而这次美苏两极格局的解体却是和平地完成的，新格局的形成也难以找到一个确切的事件来作为其标志，我们也不可能指望在以后的某一天或在某一个会议上宣告新格局的诞生。实际上，这次格局的转换既然是和平地进行的，它就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未来的世界格局就显现在当今国际社会各大力量之间不断的摩擦与冲突、协调与合作之中。当今世界，在苏联解体后，确实只剩下了美国一个超级大国，不论在政治方面，还是经济、军事、文化影响力等各个方面美国都首屈一指，但同时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也都遇到了挑战，使其必须与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共同协调才可能管理这个世界。因此，正在形成中的世界格局不可能是美国一极的格局。而其他处于世界权力结构中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尽管缺乏美国那种在各个方面都具有优势的综合能力，但在某一方面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和影响力。例如，在政治上，中、俄、欧盟等大国和国家集团在对国际事务的参与管理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第三世界国家形

成的政治性集团也越来越要求增加对国际事务的发言权，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美国的牵制；在经济上，日本和欧盟已经同美国构成了世界经济的三大中心，而且以中国的崛起为主要象征的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将有可能进一步改变世界经济力量的分布与构成；在军事上，继承了苏联大部分遗产的俄罗斯仍然是一个能够与美国相抗衡的核大国，对世界的安全仍然可以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一些地区性军事大国的崛起也会对地区内的力量分布产生影响；在文化上，不可否认，以美国大众文化为主的西方文化目前风靡世界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在青少年中间更甚，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以中国文明为代表的东亚文化的魅力也越来越吸引西方人，并成为凝聚本民族人们力量的因素之一，此外别的诸如伊斯兰等文化也在重新成为团结某一地区人们的精神力量，这些不同的文化圈对未来世界格局中的权力结构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因此，正在形成中的世界格局将会是一个多极权力结构。

二、经济因素作用上升

美苏两极格局的解体还给予人们一个启示，即经济力的竞争在今天已经越来越成为决定国家力量的主要因素。美苏两极格局的解体与过去历次格局的解体一样，也是由于格局中各个角色相互竞争，力量此消彼长，破坏了一定的平衡后而发生的。但过去的竞争及力量的显示主要是军事力量的竞争与显示，一个国家的强大与否主要表现在军事力量上，对国际政治的发言权也很大程度上由其军事力量的强弱来决定。而美苏两极格局下的竞争尽管表面上也是一种军事力量的竞争，但实际上更多地是一种经济力量的竞争。且不说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在美苏军事对峙的同时日本、西欧等国家和地区经济力量的巨大增长逐渐削弱了美苏两极格局的基础，即使美苏两极格局的解体也并非是由于美苏两国军

事力量的削弱而造成的。恰恰相反，正是由于美苏两国无限制的军备竞赛造成两国经济力量的相对削弱，才导致了苏联的解体与美国的相对衰落，使两极格局最终趋于瓦解。因此，目前世界各国都将经济发展作为自己的国家战略，国际关系中经济所占的比重在增加，其发挥的作用也在增加。

三、全球化进程加快，同时全球性问题增多

随着世界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与信息化社会的出现，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国际社会日益连成了一体，一个国家的内部变化往往会引起其他国家相应的变化，因此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的程度进一步加深，正在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但与此同时跨越国界的一些全球性问题也日益增多，而且变得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比如，保护全球环境、合理分配资源、实行人口控制、防止武器扩散、禁止毒品走私、打击恐怖活动等，已日益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课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仅仅依靠某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已经远远不够了，而必须依靠整个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因此，国家间的协调将变得更为重要。此外，要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国际社会提供足够的资金和有效的技术等。

四、非政治意识形态化冲突加剧

随着冷战后美苏由于意识形态对立而形成的军事对立的消失，爆发世界性战争的危险已大大降低，并且过去有大国作背景的不同政治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的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也不再存在。但与此同时，一些非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冲突，如源于民族、宗教或领土原因的地区冲突却有所加剧。为了解决或抑制这种没有大国作背景的冲突，国际社会加强了国际干预，如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在冷战后明显增多。当然，除联合国之外，一些地区性组织对国际

冲突的干预也在加强，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内战的干预等。

这些新的特点对每一个国家来说，可能会有不同的意义，但应该承认冷战后具有新特点的国际环境既给每个国家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即如何能够在—个多极化的趋势中在未来格局内谋求和占据—个对己有利的位置；如何能够加快本国经济的发展，增强自己的综合国力；如何协调与别国的关系，共同享受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与解决好全球性的问题；以及如何避免国际冲突波及自己并如何协助国际社会解决这些冲突，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宁。对于—些重要的国家，如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已经占据主要位置的国家，是否能够抓住—历史机遇，去应付面临的各种挑战，就显得更加重要。

第三节 日本的基本认识与对日本的影响

那么，日本如何看待冷战后变化了的国际环境，以及新的国际环境对日本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即新的国际环境是否有利于日本的未来发展，或者说新的国际环境会对日本带来些什么影响呢。现在，就让我们来—叙述与分析。

对于冷战后日本面临的国际环境，日本国内有大量各种各样的论述，但综合起来看，比较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认识有—下—些：

日本外务大臣大来佐武郎 90 年代初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撰文认为：“当前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个国家都必须适应这些变化提出的挑战。这些变化归纳起来有—下—七个方面：(1)美苏关系发生总体性变化，两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对峙状态消失；(2)大国的经济实力下降，这里主要指各主要大国的经济

实力相对于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要求不敷应付；(3)经济技术问题在大国的全球关系中日显重要；(4)美国的实力和世界霸权相对削弱；(5)西欧一体化正在形成不可忽视的力量；(6)核冲突的可能性大大减少；(7)第三世界的一些重要国家，如中国、印度等国将有更大的发言权。”^[1]

日本总理大臣海部俊树在 1991 年访问东盟各国时所作的政策演说中认为：“随着冷战结构的解体，世界开始从两极结构向多极结构转变，西欧国家与日本同美国共同作为发挥主要作用的国家其重要性日益提高。此外，亚洲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东盟各国等国家也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角色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些国家通过充满活力的发展，正在世界经济中占据较大的份额，已得到世界的承认。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这一趋势，同时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社会、外交方面也必须努力成为以自由和民主主义为基础维持稳定的力量。”^[2]

1993 年的日本《外交蓝皮书》称：“冷战的终结使国际政治中的意识形态作用下降，同时军事力的重要性也相对降低，而经济力、科技力所具有的重要性却提高了，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也日益深化。目前，自由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已经不再是与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相对立的意识形态，而已成为国际社会在协调与处理冷战后各类课题的普遍价值……基于这一普遍价值，应在广泛领域推进国际合作，共同努力创造更为安全的人类世界。”^[3]

日本总理大臣宫泽喜一在 1993 年日本国会所作的施政方针演说中认为：“东西方冷战的时代已经结束，历史潮流转向了和平，国际社会面临着构筑新的和平秩序的重大课题，围绕我国外交的环境以及在国际社会的立场也发生了变化……冷战结束，迄今为止民主国家一直追求的自由民主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基本理念得到了世界范围的承认，而另一方面冷战的结束还带来了别的结果，

给国际社会提出了新的课题，如由于民族和宗教矛盾而引发的地区冲突、以核武器为主的大规模破坏性武器的扩散等。此外，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全球环境问题等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也日益深刻。”^[4]

日本外务大臣河野洋平 1995 年在日本《外交论坛》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对日本外交而言，目前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围绕日本外交的环境近年来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亚洲虽未像欧洲那样剧烈变化，但美俄已不再用冷战思维来决定各自的行动。过去作为日本在政治、安全保障方面采取行动的价值基准之一的‘西方一员’的概念也失去了实际内容……对于国际问题，各国都会以各自利益的判断作为基础，而不会以意识形态这一单纯的价值判断为基础。”^[5]

日本外务大臣羽田孜 1995 年在日本国会所作的外交演说中认为：“在东西方冷战这一简单的坐标轴已经消失的今天，世界正在摸索建立和平与繁荣的新框架，然而道路漫长而崎岖。当今国际社会，充满了变革期的不透明与不确实性，存在众多问题需要解决。世界经济苦于众多发达国家的不景气与深刻的失业问题，地区冲突、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地球环境、人口、难民等全球规模的问题更加深刻了……同时，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深化，在处理以上这些问题时，强化国际协调是不可缺少的。”^[6]

日本外务大臣小渊惠三 1998 年 2 月在日本国会所作的外交演说中认为：“经冷战结束后一段时间的混乱，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基本观念已在世界上广泛生根，各种地区冲突也在向着趋于解决的方向发展。在我国所处的亚太地区，日美之间以及与中国、俄罗斯四国之间展开了活跃的外交，正在开始建立新的框架结构。不过另一方面，必须尽快对东亚各国目前面临的经济问题

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⁷⁾

.....

将这些论述归纳起来，大致上可以看出日本国内对冷战后国际环境的认识主要有：(1)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信奉的自由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已占据主导地位；(2)世界正在向多极化转变，美日欧等国家将在国际社会共同发挥主要作用；(3)东西方冷战结束，全球性战争的危险减少，同时构筑新秩序已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课题；(4)与此同时，地区性的领土纠纷、民族矛盾造成的冲突却依然存在，有时甚至会加剧，武器扩散、尤其是核武器的扩散成为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的新的威胁；(5)国际关系中军事力的作用相对下降，而科技力、经济力的作用却在增强；(6)全球性问题增多，诸如环境保护、经济开发援助等问题，日益需要世界各国共同来解决；(7)国家间相互依存程度提高，对话与协调已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主旋律；(8)日本所处的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已日益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地区，其中中国等大国的作用也将增强。

以上这些看法当然未必都正确，或者由于表述时间的不同而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矛盾。比如，对西方价值观念中国人就可能有不同的看法；美日欧是否能够主导世界也值得讨论；在90年代前半期对东亚经济形势乐观的看法由于亚洲的金融危机而有了新的看法；等等。但这些看法基本上代表了日本官方90年代以来的主流看法，因此将对日本的对内对外政策产生影响。在日本看来，冷战后新的国际环境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历史机遇，即有助于日本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作用。他们认为：日本作为具有西方价值观念的国家，在冷战结束的新的国际环境中处于主动地位，有可能同美、欧等国家一道去建立起一个以西方价值观念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多极化趋势的出现使日本在同美国的关系上更加独立，美国

对日本的需要也进一步加深，有可能使日本也上升为国际政治中的一极；国际关系中由于缓和带来的军事力作用相对下降而科技力与经济力作用相对上升的现实，使作为经济大国的日本的作用进一步突显，日本在这一环境中有了充分的用武之地；国际社会对话与协调的加强使日本能够更多地参与所有的国际事务，并且不需要使用军事力量即可在其中发挥作用；环境保护、经济开发援助等全球性问题的增多为日本发挥其技术、资金优势提供了场所，在这些新的领域日本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新的没有大国作背景的地区性领土纠纷及民族、宗教矛盾引起的冲突也为日本参与解决国际安全这一最重大的国际政治问题提供了机会，使日本适当增加其军事力量以及向海外派遣军事人员具有了合法性；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影响力的增加也使日本在世界经济三极结构以及国际政治中的地位提高，日本有可能成为亚洲地区的主导力量之一，在同美国与欧洲国家共同建立的新秩序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因此，日本要主动利用这一系列对己有利的事态，积极全面地参与国际事务的管理，使国际社会能够更大程度地接受日本，日本也能够为国际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正如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和前外相池田行彦所说的那样：“如今我国已不像过去那样是按照世界赋予的政治经济形势前提采取行动的国家，而应该比以往所做的国际贡献更进一步，确立能够为国际社会接受的信念，成为为世界稳定与发展发挥主导作用的国家”^[8]，“日本的安全与繁荣，在国家间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对世界的和平与繁荣正在产生巨大的影响。基于这种认识，日本必须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的各种事务，为构筑新的国际秩序发挥创造性的作用。”^[9]

客观地说，新的国际环境对日本而言确实是利大于弊。冷战结构的解体本身就意味着日本地位的提高。日本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败国，对战后形成的国际格局的变化尤为敏感，因为

这一变化将直接影响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虽然在二战结束以后的四十多年里，日本已经充分利用冷战造成的美苏对立的空隙，成功地使自己成为了一个经济大国，其地位也已经有了极大的提高，但冷战体制毕竟是脱胎于二战而建立起来的，日本在其中发挥作用受到了一定限制。冷战体制的彻底完结，使世界又面临着一次新格局的重新建立。在这次新格局的建立过程中，日本有可能彻底摆脱二战失败的阴影，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在新格局中处于一个较为有利的位置。

特别是未来的新格局将是一个多极化的格局，国际事务将更多地通过一些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来管理，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主要由美苏两大国来左右。因此，在这一结构中，日本的作用将会相应增大。实际上，造成两极格局解体，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其中日本在客观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 80 年代以前，相当程度上正是由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才显得美国的经济优势地位在不断地相对下降，也才使得连苏联那样的军事超级大国也深感经济的不振，导致了其最终解体。世界格局继续向着多极化方向发展有利于日本增加在国际政治中的发言权。

国际关系中经济因素的作用上升，对已经确立了经济大国地位的日本来说，更是一个在国际社会发挥作用的极好机会。在冷战时期的 60 年代末，日本就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大国，但在当时军事能力是构成国际社会权力的主要因素，国际关系中经济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因此日本的经济大国地位并未给它带来政治权力的增加。冷战的结束改变了这一状况，国家关系中军事威胁的减弱使大部分国家不再主要担心军事安全的问题，而国家的发展问题却成了各国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于是经济发展成为世界各国最优先考虑的课题。除此之外，世界经济规模的扩大与国家间经济相互依存程度的提高也使得地区性与世界性的经济问题

日益增多，国际关系中相当一部分活动都是有关经济问题的，如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等。日本作为一个世界性的经济大国，已构成了整个世界经济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其一举一动自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十分巨大。因此，日本利用自己强大的经济优势，既可以在冷战后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中占据主动有利的地位，又可以在地区或全球性的多边场合增大自己的发言权。

不过，日本经济在冷战后也面临挑战，过去使日本经济能够得以持续高速发展的得天独厚的条件正在失去。冷战时期，日本在被剥夺了武力与政治权力之后，不得已而专心致志地发展经济，并且在美国的安全保护与西方世界自由贸易体制下很快发展了起来。虽然从 70 年代开始日本与美国、西欧有了经济上的摩擦，但当时世界的焦点仍然集中在军事安全与意识形态的对峙上，大部分国家不得不首先为了自己的安全利益着想，经济发展还没有成为头等重要的事情。这一状况使日本能够在世界市场上几乎丝毫未遇竞争地畅通无阻地推销自己的商品，并大获其利。然而冷战结束后，每个国家都认识到了发展经济的重要性，并且都开始具体实施各自的经济发展战略，日本已不可能在不遇到竞争的情况下专心致志地发展自己的经济了。日本经济既越来越受到来自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压力，又受到了来自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挑战。90 年代以来，战后一向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而著称的日本却出现了长期的停滞不前，甚至从 1997 年后出现了负增长，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是经济增长业绩最差的。此外，在冷战以后日益国际化的今天，过去曾为日本经济发展发挥过巨大作用并曾被视为经济发展模式典范的日本式经济体制正在受到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的指责，面临着改革的命运。对此，连日本政府也不得不承认“日本式经济体制曾在战后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相当程度的有效机

能。但在近期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中……这一体制正在整体上丧失其有效机能^{〔10〕}。因此，日本是否能够面对这些挑战而继续保持其经济大国的地位对日本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这将很大程度上决定日本是否能够增加在国际社会中的发言权。目前，日本在谋求发挥更大作用的过程中最有利的资源就是经济力量，如果日本的经济失去优势地位，那么日本将难以发挥作用。

在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的解决上，日本是最具有优势的国家之一，因为全球化一般来说更有利于发达国家，在解决全球性问题时也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一些先进有效的实用技术，而这些恰恰是日本的优势所在，而且参与这些领域又易于被国际社会所接受，其影响又较大，对于日本这样的国家来说是参与国际社会事务管理最合适的一个领域。当然，这类问题看起来似乎还不是直接的政治问题，但在这些全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上参与管理并作出贡献无疑会增加参与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发言权，何况大部分的全局性问题正在越来越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重大问题。

由于民族、宗教、领土等非政治意识形态因素引起的冲突的加剧，也为日本更多参与国际政治事务带来了机会。过去的一些冲突往往总是带有大国的背景，因此日本既难以参与，而且自己也不愿意参与，而冷战后的非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冲突往往只是当事国两国间或者甚至一国内部的冲突，这就为国际社会易于统一干预提供了可能。而且，冷战后的形势也要求更多的国家参与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的管理。对日本来说，直接参与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管理问题，对于其在国际社会发挥政治作用是最为有利的。目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要求日本在维护西方世界的安全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联合国也希望日本能够为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提供更多的资金和人员的协助，对此日本国内也越来越给予宽容和理解，并以此为由突破了向海外派兵的禁忌。在为联合国

作贡献的名义下，日本的军事力量相对于过去会有所增强，这一点对于发挥更大政治作用会起到促进作用。

由此看来，冷战后的国际环境对日本而言，同样是既带来了机会，同时也带来了挑战，然而机遇要大于挑战。如果日本能够抓住这一历史机遇，真正地为国际社会作出贡献，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总是谋求一国的私利，那么就有可能在国际社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四节 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的迈进

面对如此有利的国际环境，日本开始更加积极地参与所有的国际事务，加快了其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迈进的步伐。

战后的日本，曾在国际政治中丧失了政治权力，成为国际政治中一个无足轻重的存在。这既是由于日本被战败而由战胜国强加给日本的结果，同时也是战后初期日本政府根据日本的实力与其利益所作出的自愿选择，即日本尽量避免参与国际政治事务，而一心一意地发展自己的经济。然而，随着日本经济力量的增强，到 60 年代末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70 年代中期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承认，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到 80 年代初其经济规模又超过苏联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后，日本开始在国际政治中谋求发挥积极的作用，以获取更多的政治权力。

1980 年，为当时日本总理大臣大平正芳提供咨询的日本政策研究会提出了一份“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的报告，显示出日本开始重新认识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该报告认为，“日本继续作为‘经济大国政治小国’这种跛足式国家，对国际关系的稳定来说并非好事”^{〔11〕}日本作为“西方一员”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 不仅仅

要依靠与美国的合作 而且要运用经济、政治、援助、防卫等综合手段积极创造一个有利于日本的和平国际环境。大平的继任者铃木善信也声称 日本要由“被动受益者”变为“能动创造者”即主动参与国际政治事务，加强日本对国际政治的发言权。然而，日本真正将要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积极主动作用作为日本正式的对外战略确定下来，则是在中曾根康弘执政时期。

1982年11月，中曾根作为总理大臣组成新政府，随即1983年1月24日中曾根在国会发表的第一次施政演说中就正式提出了“战后政治总决算”即对战后日本的国内国际政治进行总结 试图改变国民政治意识，去掉战败国的阴影，确立日本在国际上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大国的地位。1983年7月，中曾根在其家乡群马县对选民发表的讲话中正式提出了“政治大国”的概念，声称“要在世界政治中提高日本的发言权，增加日本不仅作为经济大国的分量，而且作为政治大国的分量”^[12]。8月，中曾根又委托京都大学教授高坂正尧等一批著名学者成立“和平问题研究会”，进一步深入研究日本的国家对外战略，1984年底该研究会即提出一份名为《国际国家日本的综合安全保障政策》的报告。该报告认为，世界已开始进入“多边管理时代”提出“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发挥强有力的领导作用并在欧洲以外的地区保持军事优势的时代已经结束”，“日本在世界上的分量增大了，因此应更多地参与决定世界的政策”^[13]。报告强调，日本应该改变战后长期以来“对于同本国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一直采取避免介入的基本态度”，而应该“向着国际国家的目标努力”，而且“不应把积极行动限制在狭义的经济作用上，而必须适应形势，增大政治作用，对于经济上的行动也有必要从政治角度进行分析”^[14]。与此同时，日本也开始增强其军事力量。1985年，通过一个逐步增加军事力量特别是海空力量的新防务计划，决心要获得保卫其海岸线1000英里以内海上交通线